

經濟與和平研究所對各國如何創造和維持和平進行了研究。但是如何在基層將這項研究付諸行動呢？加入扶輪。

為什麼要和平

撰文：傑佛瑞·約翰遜 GEOFFREY JOHNSON

十三年前，史提夫·基勒里亞 Steve Killelea 來到剛果民主共和國受戰爭蹂躪的基伍 Kivu。他從一個富有的澳大利亞軟體企業家搖身一變為親身實踐全球慈善家，曾前往非洲幫助那些在持續衝突中遭遇最嚴重恐怖的婦女和女孩。在那裡時，他記得，「我問自己一個幻想的問題：世界上最和平的國家是哪一國？我做了互聯網搜索，可是沒有答案。這讓我發現到我們對和平的了解如此之少。」

這是基勒里亞於 2008 年成立的經濟與和平研究所 (the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IEP) 的起源。通過分析有關和平的數據，IEP 之目的在確定哪些社會、政治和經濟因素創造並維持了和平。「在我們的核心，我們是一個研究機構，」該機構的美洲計畫主管米雪兒·布雷斯勞爾 Michelle Breslauer 說。「以前沒有人系統地衡量過和平。」

這呼應了基勒里亞的核心原則之一：「你沒能力衡量的東西，」他說，「你就無法理解。」

在 IEP，布雷斯勞爾 Breslauer 致力於提升組織的公眾形象，並去接觸那些擁有驅動力和資源在當地進行改革的人。「我們希望接觸更廣泛的對象，而不僅僅是學術界，」她說，而 IEP 和扶輪之間的新夥伴關係正在幫助實現這一目標。在去年秋天 IEP 在史丹佛大學共同贊助的和平會議上，她回憶道，「每次我轉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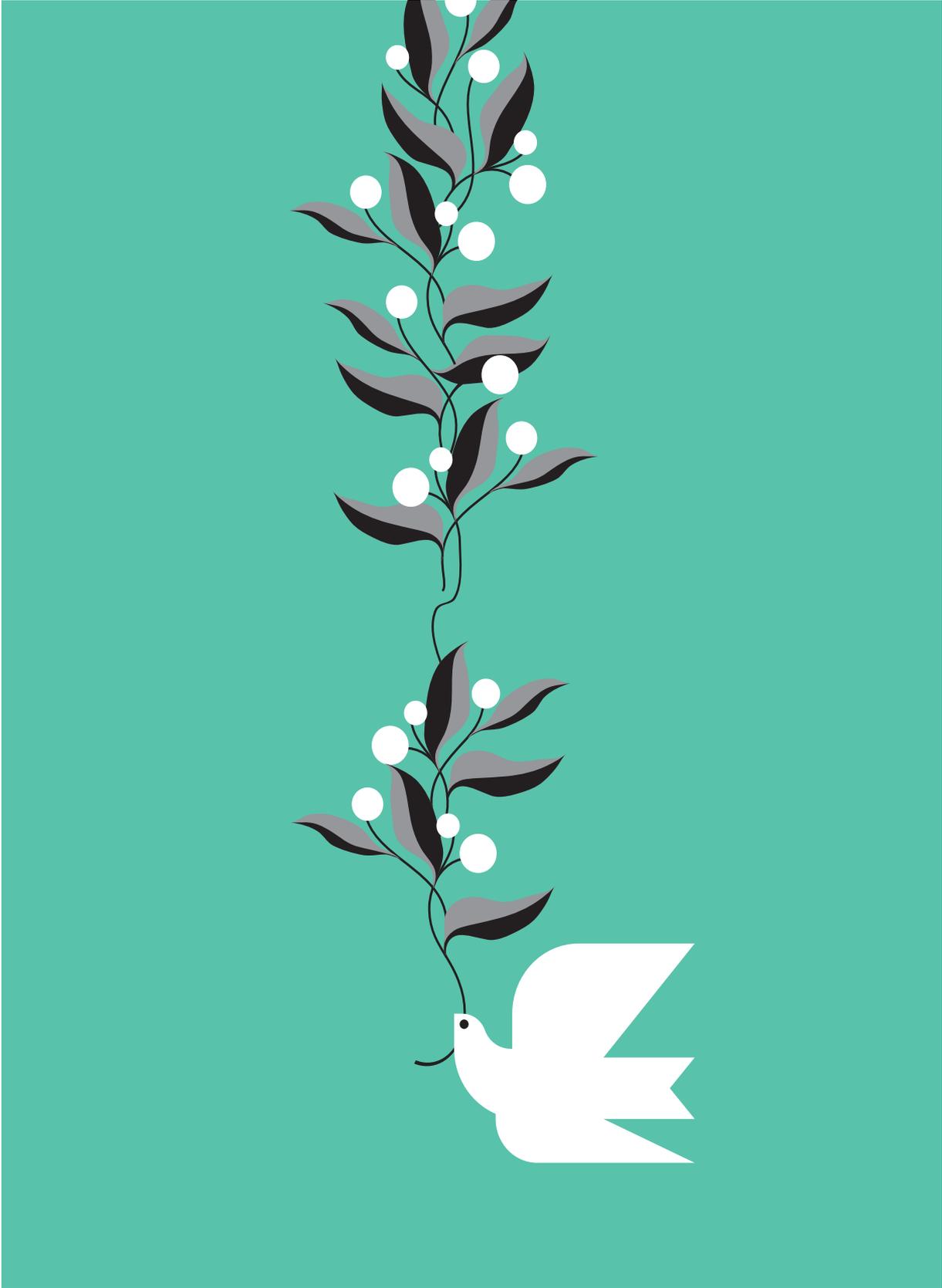
身，就會看到一個扶輪社員。」他們的熱忱讓她感到無比興奮。

「建構和平不是只有政府才能做，」布雷斯勞爾說。「我們需要改變人們對於在自己社區建構和平的思考方式。IEP 現在可以在基層進行激勵。在地方上，扶輪社員們可以成為推動世界和平的領導者。」

經濟與和平研究所的基礎是積極和平 (positive peace) 的概念，這是一個與挪威的社會學家及開創性的和平研究員約翰·格爾東 Johan Galtung 密切相關的理論。1964 年 3 月，在他的和平研究雜誌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創刊號上，格爾東區分了「消極和平 (negative peace)」，即沒有暴力，沒有戰爭…與積極和平，後者是人類社會的融合。」

布雷斯勞爾更稍微簡單地打破了消極和積極和平之間的區別。「和平不只是意味著缺少某樣東西，」她說。「畢竟，專制政權可能擁有和平。和平也是指存在某樣東西。」訣竅在於確定究竟那是什麼東西。

從基伍返回後，基勒里亞著手填補有關和平條件的數據中的巨大空白。「我非常擅長在畫布上找到沒有其他人畫過的白色地帶，」他說。2007 年 5 月，他發表了第一份全球和平指數 (GPI)；此後每年都推出新版的 GPI 以及其他指數。其中包括「積極和平報告」，其中分析了「維持和平的因素」。(有關 IEP



積極和平的 八大支柱

運作良好的政府

一個有效的政府提供高質量的公共和市民服務、創造信任及參與、表現出政治穩定、並維護法治。

健全的事業環境

優異的經濟條件以及支持私營部門的機構促進了商業競爭力和經濟生產力——這兩者都與最和平的國家相關。

資源的平均分配

和平國家傾向於確保取得教育，衛生等資源的公平性，並在較小程度上確保所得分配的公平性。

接受其他人的權利

保障基本人權和自由的正式法律，以及與公民行為有關的非正式社會和文化規範，是和平國家的標誌。

與鄰國關係良好

與其他國家維持和平關係的國家，整體上來講更和平、更趨於政治穩定、有更有效的政府、而且較少有組織的內部衝突。

資訊的自由流動

自由和獨立的媒體傳播資訊的方式能增加公民的知識，並幫助個人、企業和政府做出更好的決策。

高水平的人力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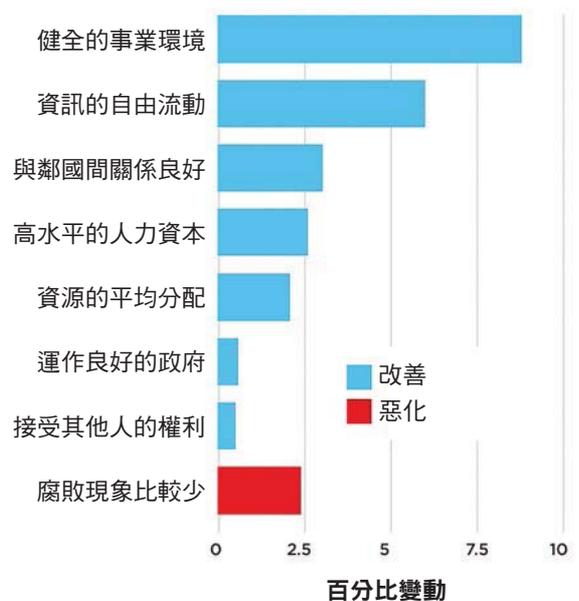
技術熟練和受過教育的民眾是經濟生產力、政治參與和社會資本的指標。

腐敗現象比較少

在腐敗程度高的社會，資源未被有效分配，往往導致缺乏基本服務的資金和內亂。腐敗程度低則增強了對機構的信心和信任。

積極和平支柱的百分比變化（2005-17年）

自2005年以來，八大支柱中有七個支柱在全球有所改善，但到2017年，腐敗程度惡化了2.4%。



報告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以數字衡量和平 Peace by the Numbers，第53頁。」

IEP將這些因素——促進積極和平的基本要素——編成了積極和平的八大支柱（見左側方框），與24項指標相關。這些支柱用於計算世界不同地區的積極和平的水平。正如2018年積極和平報告所解釋的那樣，「這為一個國家建構和維持和平的效能提供了基準衡量標準。」積極和平也可以作為「衝突、暴力和不穩定的可能性」的預測指標。

但這個解釋的簡單性掩蓋了八大支柱之間在現實世界的複雜關係。「你必須透過它們如何作為一個系統進行互動而不是作為個別支柱來思考，」布雷斯勞爾說。「例如，你可能有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但沒有工作機會，因此就會不滿意——這會造成社會動蕩的可能性。「因此，這不僅僅是一個因素，也不僅僅是強化一個支柱而已。你必須把社會的不同向量匯集在一起。」

此外，正如「積極和平報告」所承認的那

樣，積極和平及其支柱的表現方式「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文化規範和具體情況。適合於某個國家的，可能不適合於另一個國家。...每個社會在某種程度上都是獨一無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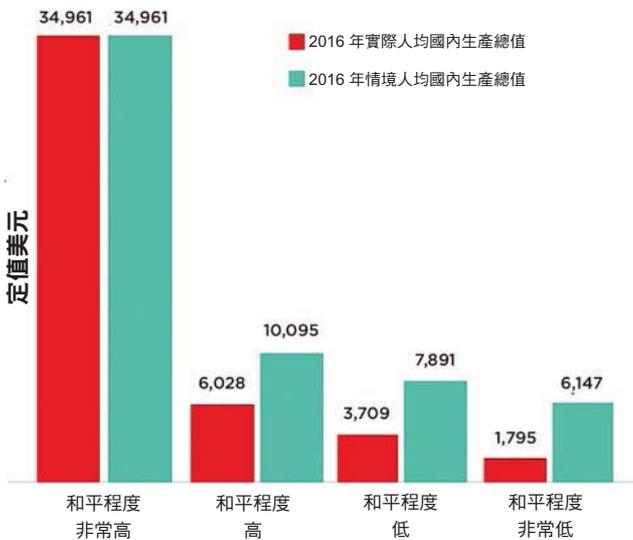
基勒里亞和任何人一樣完全了解這個事實。「我學到的要點是，沒有任何萬靈丹能創造和平，」他說。「增進和平比削弱和平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這種洞察力讓他想知道是否有什麼具體方式可以讓他有助於創造和平。「從 IEP 的角度來看，我們非常熱衷於實施我們透過研究而發展出來的概念，」他說。

加入扶輪。

高和低和平國家之間的繁榮差距 (2016 年)

在和平程度低的國家實現了與和平程度高的國家相當的平均成長率的情況下，前者均收入將比 2016 年高出三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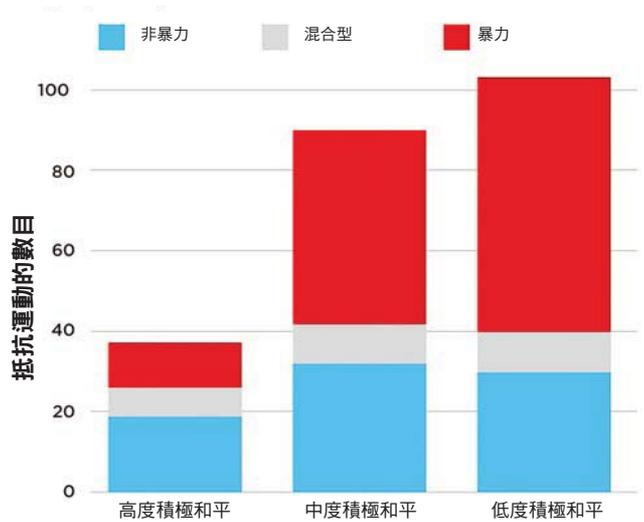


「我在扶輪環境中長大，」基勒里亞回憶道。「我的父親是一名已有 30 年社齡的扶輪社員。扶輪是他的公民服務形式。在我成長過程，總會有交換學生住在我們家。」

IEP 與扶輪社的關係在 2015 年起飛，當彼得·基爾 Peter Kyle 邀請基勒里亞在巴西聖保羅國際扶輪和平研討會上致詞時，他當時是扶輪和平中心委員會的主委（他現在是扶輪代表網絡的主任）。「史蒂夫非常腳踏實地，

抵抗運動的流行和性質

1945 年至 2006 年期間，91% 的暴力抵抗運動發生在積極和平較弱的國家。在積極和平較強的國家，非暴力的抵抗運動比例較高。



是扶輪的堅定支持者，」基爾說，他來自紐西蘭，並承認與澳大利亞籍的基勒里亞之間存在「友好的對立」。「他渴望在扶輪與 IEP 之間建立更緊密的關係。」

2016 年秋，這兩個組織——以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研究所，華盛頓特區一個以建構和平為宗旨的組織——透過在康帕拉的一個扶輪全球獎助金舉辦了為期三天的積極和平研討會，吸引了來自烏干達各地 200 人參加。除其他事項外，研討會為八大支柱中的每一支柱都引進了一系列培訓活動，並擬定了讓參與者能帶回社區去實施的若干行動。

其中一名參與者是中學教師茱蒂·卡庫巴 Jude Kakuba，她也是南第特 - 康帕拉 Nateete-Kampala 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他在坎帕拉的南第特社區的一所學校進行了一項識字訓練計畫，該計畫包括以和平八大支柱的每一支柱為焦點的活動。最後，該計畫將學校的學業成績從該區域的後半段提升到了前三名，並將出席率提高了 40%。

該計畫有一部分的重點在於如何強化與鄰國保持良好關係相關的支柱。正如基勒里亞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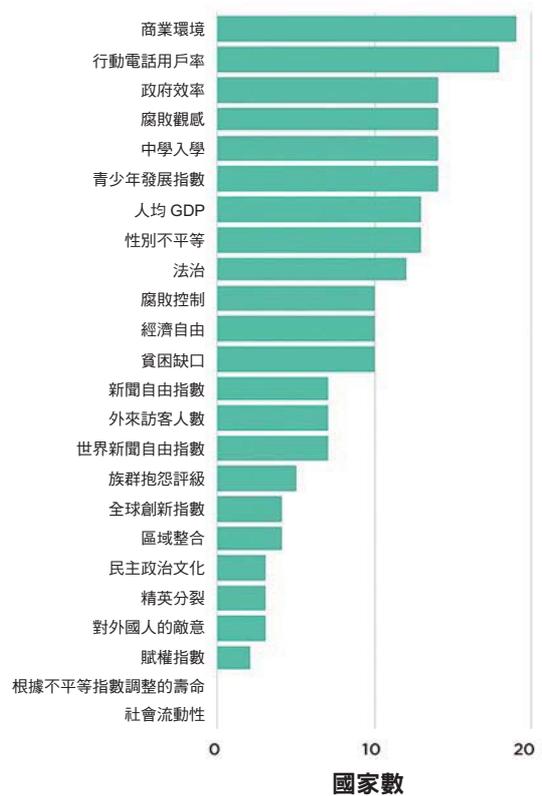
的那樣，飢餓的學生一直在偷當地農民的芒果和其他水果，難怪這些農民都很生氣。飢餓的孩子們也會在午餐時間偷偷溜走，從附近的農園偷走農產品。藉由在學校場地種植果樹，並在午餐時提供粥，該計畫緩解了學校與鄰居的緊張關係。更棒的是，這些新措施有助於提高出席率和考試成績。

烏干達研討會的成功促使 IEP 於 2017 年與扶輪建立了夥伴關係。基勒里亞認為這是一個機會，可以將扶輪的六個重點領域「集中在一個傘下」。對於基爾來說，他預計 IEP 之注重和平與經濟將對扶輪社員產生特別的吸引力。他表示，「和平事業完全與扶輪目標一致。」正如 IEP 所說，積極和平使得「企業更容易出售、企業家和科學家更容易創新、個人更容易生產、政府更容易有效監管。」

現在是第二年，這種夥伴關係已經取得了成果，包括成立扶輪積極和平學院（見「關於扶持積極和平學院的 4 個問題」，第

全球和平指數進步最大 20 個國家的積極和平指標 (2007-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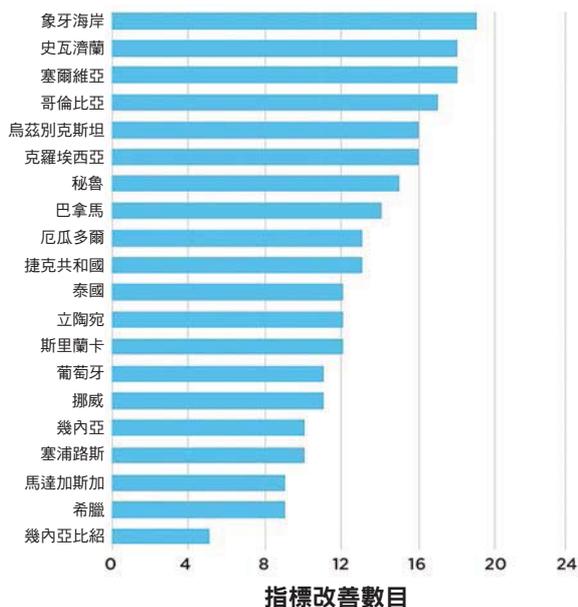
商業環境、行動電話及政府效率指標的改善是和平大幅增長的常見標誌。



全球和平指數 (GPI) 分數 (2005-14)

進步最大 20 國家之積極和平指標數

得分大幅提高的國家中，有 85% 的國家之前在 24 項積極和平指標中有 10 項或更多項有所改善。



57 頁) 和 IEP 大使計畫。2016 年，在與扶輪的合作正式開始之前，大使計畫迎來了 135 名扶輪和平獎學金學生，他們在 51 個國家做了 248 場關於積極和平的演講。

即將來自夥伴關係的重要行動之一是由世界各地的扶輪社和地區舉辦的一系列積極和平研討會。以社區為基礎的討論會將匯集不同的領導人及和平建構者團體，來討論有哪些種類的有影響力且可衡量的投資可以促進當地的積極和平。今年春天，扶輪和 IEP 將在墨西哥和哥倫比亞舉辦一系列討論會，來教居民如何在社區實施積極和平計畫。

「我們需要找到推動和平工作進程的實際方法，」基爾說。「扶輪社員們可以做些什麼來推進八大支柱？」扶輪與 IEP 的合作應該有助於為這個問題提供答案。

和平數字：IEP 的指數和報告

從 2007 年推出第一個全球和平指數開始，經濟與和平研究所已經提出了一系列報告。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檢查來自 163 個國家和獨立地區的數據，囊括全世界 99.7% 以上的人口。完整的報告可在 economicandpeace.org/reports 上找到。請看以下 2018 年發布的一些報告。

全球和平指數 GLOBAL PEACE INDEX 發現和平水平比上一年度下降了 0.27%，這是全球和平指數連續第四年下降。雖然 71 個國家的和平水平有所改善，但有 92 個國家下降，這是自 2010 年報告以來單一年份最高的數字。冰島被認為是最和平的國家；敘利亞最不和平。

積極和平報告 POSITIVE PEACE REPORT 顯示自 2005 年以來積極和平指數改善了 2.4%。（根據 IEP，積極和平每增加 1%，相當於人均實際國內生產總值成長 2.9%。）在所研究的 163 個國家中，有 110 個國家見到積極和平的改善；該報告指出瑞典、芬蘭、和挪威是積極和平程度最高的三個國家。在不利方面，八個和平支柱中有四個在 2013 年至 2017 年期間惡化，資訊自由流動每年下降 0.4%，受到最嚴重打擊。

和平的經濟價值 ECONOMIC VALUE OF PEACE 報告得到的結論是，2017 年暴力對全球經濟的影響為 14.76 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球

GDP 的 12.4% 或每人 1,998 美元。IEP 承認其估計值比去年增加了 2.1%，「被認為是保守的」。

根據全球恐怖主義指數 GLOBAL TERRORISM INDEX，2017 年恐怖主義造成的死亡人數比 2016 年減少了 27%；儘管如此，2017 年仍有近 19,000 人死因與恐怖主義相關。恐怖主義的經濟影響保守估計為 520 億美元。

商業與和平 BUSINESS & PEACE 報告證實了 IEP 提出的高水平的積極和平與強勁的經濟表現之間的關聯性：「在過去六十年中，按照 [全球和平指數] 衡量，高度和平的國家的 GDP 增長率比低度和平的國家高出三倍。」該報告引用「歷史分析」，預測積極和平進步大的國家可望獲得相應的經濟回報。

